



青年扬帆

扬帆,193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,曾经在新四军和华东局中担任重要职务,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第二任公安局长。然而,在20世纪50年代,扬帆因所谓“潘汉年、扬帆反革命集团案”而蒙冤25年。在这期间,我作为妻子和几个儿女顶着巨大压力,一直在寻找他的踪迹,直到把他拉回亲人的身边。

### 年末最后一天失去自由

1953年底,扬帆被免去所有行政职务。1954年的最后一天,扬帆和家人在家中团聚小酌。正在这时,一个电话打到家里。打电话的是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许建国。当时许建国和时任上海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黄赤波一同去北京开会,他们一回上海就找扬帆,可见一定是带回了跟扬帆有关的消息。

这天晚上扬帆出门时是兴冲冲的,他觉得是好消息。走时扬帆和我没有道别,然而这一别就是25年。

扬帆是带着警卫员坐汽车走的,走了没多久,他的警卫员就回来了。他非常紧张地说:“李琼同志,首长出事情了。”原来,汽车并没有把扬帆送到许建国家里,而是去了隔壁的岳阳路俱乐部。扬帆从汽车上下来,警卫处的人就对他的警卫员说:“你回去吧,这里没有你的事了。”警卫员看到扬帆被两名警卫处的人架着进去了。

听了警卫员的描述,我当时非常紧张,但是在警卫员面前,我还是故作镇静。我对警卫员说:“好的,你回去休息吧。”我独自等扬帆的消息。到晚上10点,警卫处长到我家来,他说:“扬帆要到北京去开会,你准备一些衣服。”当时我心里明白,扬帆不是被隔离就是被逮捕了。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,这个疑惑没法问出口,只好给扬帆整理了一箱子衣服,让警卫处长带去。

第二天上午,也就是1955年的元旦,许建国把我叫到他的家,对我说:“李琼同志,扬帆到北京去开会了,这件事你对任何人都要讲是开会,对家里人也是这样讲。”又说:“你小孩比较多,你要把孩子带好。”这些话更加证实了我的猜测:扬帆一定遇到了不好的事情。我怎么也不明白扬帆究竟有什么问题。回想几个月前,我曾经问过扬帆这个问题。

那是1954年9月的一天,当时公安局召开了一个科长以上的干部大会,这个大会实际上是针对扬帆的批判大会。开始是叫扬帆作自我检查,他作完检查以后,就让他回家了。会议之后的内容是大家批判揭发扬帆,主要说他对一些反革命分子和特务分子他包庇这些人。讲到后来,有的人上纲上线,说扬帆这样做不是国民党的代理人,不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,是无法理解的。我当时在场,听到了这些话很紧张,也无法理解,更无法辩驳。

会后,许建国对我说:“今天会上的事情,你一句也不许

# “潘扬案”中的扬帆一家

向扬帆传达,你要用党性来保证。同时,你这几天要注意扬帆的活动,如果有不正常的事情,你要立刻打电话告诉我。”我回去后没有同扬帆提会上的事情。然而我忍不住对扬帆说:“你是公安局长,你对党的政策比我要懂得多,我是一般干部。但是,如果你心里真有话的话,我希望你找个同志谈话,像谭震林这样的同志,沟通沟通。”没想到扬帆听了这话马上跳起来说:“连你也不相信我了?我该讲的都讲了,该说的都说了。如果有人认为我还有问题,哪怕十年、二十年,我都奉陪到底。”

### 生离之后是死别

在扬帆被带走的四个月后,也就是1955年4月,黄赤波来到我家。他告诉我:“扬帆被逮捕了。”几乎就在宣布扬帆被捕的同时,“潘汉年、扬帆反革命集团案”震动全国。

扬帆走后,我一直瞒着扬帆的父母。然而在扬帆走后大概一个月,他父亲有一天忽然对孙女小殷说:“你妈妈说你爸爸去开会了,是骗我们的,他失踪了。”这时老人已经猜到儿子出了意外。到了5月,老人高血压的毛病突然加重,引起脑溢血,我把他送到医院之后两三天就去世了。

在扬帆的父亲去世后,和我们同住的扬帆的姐姐,在9月因为肝硬化腹水也去世了。第二年,扬帆的母亲也因为丈夫、女儿去世、儿子失踪郁郁而终。一年之内一同生活的3个人去世了。

然而到了1957年,我最小的儿子,有一天突然发烧,我把他送到儿童医院去看病,医生说是感冒,为保险起见,住院几天观察一下。我当时心想,感冒不要紧,自己家里经济拮据,住院费用太大,另外自己上班脱不开身,没法在医院陪孩子。于是要了一点药,就把孩子带回了家。第二天,我还是照常去上班。等到第三天下班回家发现儿子还在发烧。我有点儿急了,抱着孩子又去了医院。医生再次建议住院,我同意了。等到第二天,检查结果出来了,儿子得的是小儿麻疹症。而此时孩子神志还清醒,他对我说:“我要吃橘子。”我赶紧答应:“妈妈这就给你去买。”没想到等橘子买回来,儿子已经死了。

### 在艰难的岁月里苦熬

扬帆被捕之后,我进了学习班。从学习班出来以后,我被分配到卢湾区中心医院工作。因为“反革命家属”是不能在公安系统工作的。

对于我们家这样成分的孩子,有几个规定:第一,不许当兵;第二,不许到工厂做工;第三,初中毕业后不能继续读书。所以,我和扬帆的几个孩子都是插队落户。我们的二女儿扬小舜因为有哮喘病,没法插队落户,初中毕业以后在家里呆了8年没有工作。

扬小舜的妹妹扬小朝很早就插队落户了,她知道自己家里的情况,于是更努力地工作。然而,一次次可以回城工作或念书的机会都与她无关。

有一年,一同插队的一个知青回上海探亲,这个知青是扬小朝的同学,她们去了同一个农村,两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。这个知青从上海探亲回去后,她们几个人约好去她家聚会。那一天,她们就到了朋友那里,这个朋友突然很神秘地跟大家说:“现在上海流传着一个故事,你们要听吗?”大家一听讲故事都很高兴,就聚精会神地听她讲。这个故事名字叫

《绿色的尸首》。然而到了故事结束,真相大白的时候,这个朋友对着小朝说:“你知道潜伏特务是谁吗?就是公安局长扬帆,就是你爸爸。”小朝当时一下子惊呆了,旁边的其他同学也很吃惊,屋子里鸦雀无声。

像这样的事情,对于我们一家人来说并不是一次两次,在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一直持续着。

### 痛苦地办理离婚

距离扬帆被带走已经有10年了,除了开头几个月有过几封信,之后再没能得到他的任何消息。为了孩子们的前途,我作出了一个决定:和扬帆离婚。

这一年是1964年,此时几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,而头顶着“反革命家属”的帽子,对于孩子的前途非常不利。当时我在卢湾区中心医院工作,单位的领导几次找我谈话,希望我和扬帆脱离关系。我委婉地拒绝了组织让我离婚的要求。然而没几天,领导又来找我谈话,还是要求我把离婚手续办了,组织上可以出面请法院的同志上门办理手续。这样,我第一出于对家庭和孩子的考虑,第二迫于一定的压力,同意和扬帆离婚。

手续办完了以后,我想来想去,一定要把事情跟扬帆说明一下。但是,我已经有许多年没有扬帆的消息了。我要求跟扬帆通信,组织同意了我的要求。于是我写了一个条子,通过组织转给扬帆。

我明白,这个条子一定要经过审查才能到扬帆手中,于是就写下了几行字:“鉴于我们当前的处境,我感觉到我们的关系没有保持下去的必要,五个孩子都由我一个人来抚养。”在纸条中,我写明一个人抚养五个孩子,就是想告诉扬帆,我虽然办理了离婚手续,但这辈子不会再和别人结婚。写了这个条子之后,组织上转来了扬帆写的一个条子,在这个条子上,他什么都没表示,既不表示同意离婚,也没说不同意,上面只有一句话:“六个孩子怎么只剩五个了呢?”可怜最小的孩子,扬帆走的时候他才两个月,儿子死了扬帆一直不知道。

事实上,在组织帮我和扬帆办理离婚手续之前,扬帆就有过类似的想法。虽然他一直坚持自己是无辜的,是被冤枉的,总有一天会澄清。然而毕竟一顶“反革命”的帽子,对一个家庭的影响是很大的。在被关押近10年之后,扬帆觉得出狱的希望越来越渺茫,在左思右想之后,他写了一封信给组织,要求办理离婚手续。他写了这封信之后,没有得到丝毫回音。不久,组织就出面帮我办理了离婚手续。

### 二十多年辗转打探消息

虽然我和扬帆办理了离婚手续,但我一刻也没有忘记扬帆。我每年过年的时候都要写一封信给公安部,打听扬帆的消息。在信中我总是问三个问题:第一,扬帆到底犯了什么罪?第二,他现在人在哪里?还活着吗?第三,如果活着,能去看他吗?但是每年写,每年都没有回音。这样,一直到了1974年,就在我将要绝望的时候,忽然传来了一个不太确定的有关扬帆的消息。

这个消息是我的三女儿扬小朝带来的。小朝的一个中学同学正好从内蒙古调到湖北沙洋农场。有一天,她托人告诉小朝,说她父亲扬帆可能已经到了湖北沙洋农场的果园大队。因为那里来了一个疯

老头,自称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。当时我觉得有可能,但是没法确定。于是,我叫几个孩子分别写信到中央,打听扬帆的消息。

不久,在家赋闲8年、刚刚找到工作的二女儿扬小舜,被领导叫到单位,她写给中央的信有了回音。来找小舜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两位同志,他们见到小舜的第一句话就是:“你给中央写信啦?”小舜回答:“是。”两位同志教训了她一顿,说:“信现在已经转到我们这里了,你的信写得很莫名其妙。首先你说这么多年,你不知道你父亲犯了什么罪?判了什么刑?现在在哪里?我们就觉得很奇怪。‘潘扬反革命案’,这么大的案子,全国人民都知道,他的结论不就是‘反革命’、‘内奸’吗?怎么你会说你们不知道?”小舜只好说:“就算他是‘反革命’、‘内奸’,那他到底犯了什么罪行?可以让我们知道吗?否则我们怎么跟他划清界限呢?”两位同志回答:“扬帆犯的罪由他本人负责,你只要跟他划清界限就行了,不需要去了解他究竟做了什么。”小舜继续问:“那么他人在哪里?让我们子女跟他通通信,让他能早日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。”公安局同志一口拒绝:“没有必要,扬帆现在接受改造的情绪很稳定,你如果跟他通信,会扰乱他接受改造的情绪。”

几天之后,我从“五七”干校回来,小舜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。我听了很振奋,说:“至少这让我们得到了一个确定的信息,就是你父亲还活着。”

1976年,“文革”结束了,我又开始想办法打听扬帆的消息。然而,一封封寄出去的信还是如石沉大海。一直到了1978年,一个从北京来的朋友为我出了个主意:“胡耀邦同志调任组织部长后,我听有人讲出来小道消息,说胡耀邦对‘耀邦亲启’的信,如果你不要给我处理掉了,至少要读给我听听。”她建议我试试写信给胡耀邦。

我马上写了一封信,不但写了“耀邦亲启”,还用了双挂号寄去。信寄出后大概20多天,果然有了回音。上海市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来找我,说:“中央组织部回电来了,说你可以到湖北沙洋劳改农场去看望扬帆。”

### 特殊的重逢

1978年的秋天,我和儿子扬忠平一路颠簸,来到扬帆所在的湖北沙洋农场。

当天到劳改农场的时候,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,我心急如焚,希望尽快看到扬帆,便连夜赶去扬帆所在的果园大队。当时是农场的指导员带我们母子去的。到了那里,扬帆已经睡了,有个照顾他的李老头起来接待我们。

我看到扬帆住的地方是一排小瓦房其中的一间,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两张床,扬帆睡一张,李老头睡一张。除了两张床,就只有一个台子和一个凳子。这个时候李老头已经把扬帆唤醒了,坐在床上的扬帆头发白了,瘦了很多,最为可怕的是眼睛已经瞎了。

看到扬帆这个样子,我很心酸,忍着眼泪,叫扬帆的名字,儿子也叫爸爸。但是扬帆都不答应,就连指导员跟他说,你的家属来看你了,他也不答应。他说:“不对,你们都是假的,你们不要来了,走吧。”扬帆这样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预料,我拼命对扬帆说:“我们是真的,我们是上海来的。”但无

论我怎么讲,扬帆都不相信。扬帆得了精神分裂症,连最亲近的人都不认识了。

第二天,我们再去的时候,农场的指导员跟我们讲,扬帆一早就到他的房间里来,跟他说:“昨天来的两个人是假的,你不要理他们,我也不接待了。”之后,扬帆一见到我和儿子来,马上就走,一连几次都是如此。

没有办法跟扬帆讲上话,我和儿子只好通过扬帆的邻居,了解了扬帆这几年在沙洋农场的一些情况。

我和儿子在沙洋农场待了一个星期,但和扬帆的关系没有丝毫进展。于是,我们决定先回上海,然后再想办法。

就在我们决定走的时候,扬帆破天荒陪我们吃了一顿饭。吃饭的时候,他对我儿子说:“今天吃饭是组织上叫我陪你们的,你们两个人我还是不认识。”能这样坐在一起吃饭,相比之前几天,已经是巨大的突破了。

### 用亲情唤回扬帆

离开湖北沙洋农场回到上海之后,我立即通过各种途径,要求把扬帆接回上海治疗。不久,中央同意了我的请求。1979年初,一架从湖北起飞的飞机,载着扬帆回到了阔别25年的上海。

刚到上海的时候,除了精神方面,扬帆的身体也非常虚弱,一年之内病危过几次。然而,当他身体稍稍好转的时候,就写了一封信给邓颖超。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:我已经回到上海了,没有什么大病,希望组织上给我安排工作,我希望重新出来工作。这封信并没有寄出,因为他的身体根本没法重新工作。然而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看了,都很感动。

1979年,扬帆整整一年都住在医院里,依然戴着“反革命”和“内奸”两顶帽子。然而,他回来的消息不胫而走,许多以前的老战友不避嫌疑,纷纷来看望扬帆,这让扬帆感受到了同志之间久违的温暖。

在华东医院住院的时候,有一天晚上,三女儿扬小朝陪着父亲。当时华东医院两个房间当中有一个卫生间,另一个房间的人用完卫生间,把靠近扬帆这边的门也锁住了,一直到天亮都没有打开。扬帆没法用卫生间,于是小朝就去隔壁敲门。结果隔壁门一打开,是一个很朴素的老先生。小朝把事情说了,老先生立刻道歉:“不好意思,不好意思,我去打个招呼吧。”他就问小朝:“你爸爸叫什么名字?”小朝回答:“我爸爸叫扬帆。”

一听到扬帆的名字,老先生就吃了一惊,快步地跑了过去,穿过卫生间,跑到扬帆的房间。见到扬帆,他双手就伸出来了,说:“扬帆同志,我是粟裕啊!”扬帆听了也很吃惊:“啊,粟裕啊!”两人的手握在一起,非常激动。粟裕的一声“同志”让扬帆尤其激动,他已经有整整

25年没有听到这个称呼了。老战友的关心,让扬帆的病情进一步稳定。然而对家人,他始终不肯承认。为此,让几个女儿来当护士,三班倒,以此接近扬帆,跟他建立感情。

一开始时,扬帆非常客气,过了一段时间以后,几姐妹觉得时机差不多了,就开始给他讲一些家里的情况。

有一次,三女儿扬小朝告诉扬帆:“我这个小朝的名字您知道吗,就是你起的名字啊。当时你想要个儿子,但是用那个‘招弟’的‘招’呢,觉得蛮土、蛮俗气的。因为你很喜欢一个报纸上的《朝花》版,就给我起了这个‘朝’。”扬帆听了没有作声。小朝就继续讲:“姐姐叫小殷(后改名晓云),这个‘殷’呢,是奶奶的姓。妹妹叫小苏,是你到苏联去的时候生的,也是你起的名字。我们都是你的女儿。”扬帆听了这个话,沉默了很久,最后说:“这样吧,我认你们做干女儿。扬帆先承认了女儿,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肯承认我,这让我伤心了好久。我只能默默照顾着扬帆,希望有一天能够感动他。”

扬帆出院后,回到家里开始由我照顾。然而,扬帆从来不叫我,也不跟我说话。

有一天,胡立教和陈丕显到上海来看扬帆。当时陈丕显把我们一家人都喊到房间里,声音很大地对扬帆说:“老扬,你爱人李琼为你吃了多少苦,你为什么还不认她?”当时扬帆没有说话。几天之后,他突然说:“李琼,给我倒杯茶好吗?”当时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说:“什么?你叫我什么?”扬帆说:“你啊。”我问:“你不是说我是假的吗?冒充的吗?”当时扬帆回答:“不是我承认你,是北京来电话说,你是真的,不是假的。”谁也不知道扬帆这个说法是当时他的幻听幻觉帮了忙,还是他给自己一个台阶下,反正从这个时候开始,他就承认我了,我们之间的关系彻底转变过来了。

### 获得彻底平反

我除了好好照顾扬帆,让他安享晚年之外,仅有一个心愿,就是还扬帆一个清白。为此,我几次给中央写信,并终于有回音了。

1980年的一天,公安部派两位同志来到我们家,宣读扬帆的平反书。平反书说:“反革命分子”跟扬帆无关,应予平反;“内奸”问题,根本没有的事,应予平反;在上海工作期间,在潘汉年领导下,包庇重用了大批“反革命分子”,错误是严重的。

这样的结论,让我非常不满意,我把想法跟两位同志说了。那两位同志说:“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答复你,要请示。”

1983年,中共中央为扬帆的冤案彻底平反,之前平反时遗留的尾巴,也得到了彻底解决,并肯定了扬帆在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期间的工作成绩。正如粟裕所说:所有的事情最终都要让历史来说话,历史是公正的。(李琼口述 董洁心整理 来源:百年潮)



老年扬帆